

政治信任风险视角下的政治安全逻辑

胡象明

摘 要 政治信任包括政治系统内部组织体系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公民及其它外部因素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前者可称为内部信任,后者可称为外部信任。在现代风险社会,无论是内部信任还是外部信任,都不可避免地存在风险。政治信任及其风险的形成和演变既受政治文化的影响,又受政治制度的影响。政治安全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包括政治系统的内部安全逻辑、外部安全逻辑以及内部组织体系与外部环境力量相互作用的安全逻辑。从风险理论的视角看,政治信任的风险对政治安全具有传导作用。无论是政治系统的内部信任风险、外部信任风险,还是内外部信任风险的相互作用,都与政治安全风险存在着特定的逻辑关系。因此,防范控制政治信任风险对防范控制政治安全风险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政治信任;政治安全;信任风险;安全风险;风险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1)04-0140-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ZD080)

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来,政治安全问题不但受到政界高度重视,而且引起政治学界的高度关注,对政治安全的内涵、特征、实质及其实现途径等问题,已做了一些有益探索,这些探索对我们进一步探讨政治安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启发作用。政治信任与政治安全密切相关。如果没有政治系统内部组织体系各要素之间的互信,政治系统就不可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如果没有公民及其它外部因素对政治系统的高度信任,政治系统就不可能有一个良好的外部安全环境和条件。在现代风险社会条件下,政治信任存在着难以避免的风险,这种风险有可能传导至政治安全,因此,政治信任风险与政治安全风险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系。

一、政治信任风险及其影响因素

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受到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广泛关注。社会学家卢曼(N.Luhmann)认为,信任连接个体选择和社会结构,受到心理和社会系统的影响,是一种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他指出:“信任,通过复杂性的简化,排除了某种行动的可能性:这种行动离开信任是不可能的,无吸引力的——换言之,本来不会实行的。”^[1](P32)人类社会生活是一个复杂系统,人们在这个系统中的行动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对行动的决策变得异常艰难。为了决策的有效性,人们对这个复杂系统的认知需要进行简化,即什么是可信的,什么是不可信的。其实,所谓信任,就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与未知领域的行动相联系的信念。因此,信任是关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或组织与组织之间关系的一种主观范畴,它是一种人际范畴,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畴;其形式是主观的,但其内容是客观的,或会导致一定的客观效果,对信任主体的行动决策及其行动本身具有重要影响。

关于政治信任,有学者认为它是民众基于理性思考、实践感知、心理预期等对政府及政府官员、政治

制度等的信心和信赖,反映民众在情感上对政府的好恶。一般说来,政治信任包括内部信任与外部信任两个方面:内部信任主要指政治系统内部组织体系各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组织与官员之间以及官员与官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外部信任主要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及其它外部环境因素对其政治机构及其官员的信任。其中,内部信任是政治系统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因,外部信任是政治系统安全的重要保障。如果政治系统内部组织体系各要素之间失去互信,失去了公民及其它外部环境因素对政治系统及其官员的信任或信任度极大地下降,整个政治系统的信任就会面临重大风险。当今国内外学者对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公民对政治机构和官员信任的研究。很多研究表明,相当多的国家在政治信任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较低或下降的风险。如亚洲民主调查(Asian Barometer)研究组2001-2003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一半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在政治信任方面的得分在60分以下。该项研究对18岁成人进行抽样问卷调查,样本分布:中国大陆3183,中国香港811,中国台湾1415,韩国1500,日本1418,蒙古1144,菲律宾1200,泰国1546,共12217个有效样本。分析结果显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信任水平分别是:中国大陆0.907,泰国0.664,中国香港0.662,蒙古0.538,菲律宾0.475,中国台湾0.451,日本0.387,韩国0.371,其中有5个国家或地区的信任水平低于0.6的及格率^[2](P79-86)。

政治信任不足,对政治系统来说,表明政治信任存在着较大或很大风险。所谓风险,指的就是一种不确定性。就政治信任风险而言,所谓不确定性,从理论上讲,是指政治信任度既存在着上升的可能性,也存在着下降的可能性。但政治系统关心的显然是政治信任度下降的可能性。因此,严格地说,政治信任风险就是政治信任度下降的可能性或概率。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度上升或下降呢?或者说,引发政治信任风险的原因是什么呢?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相关观点较多,如刘建平、周云在《政府信任的概念、影响因素、变化机制》一文中提出:政府的绩效、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社会文化、媒体以及人口统计学变量都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3](P83-89)。又如王毅杰、乔文俊在《中国城乡居民政府信任及其影响因素》一文从利己主义、文化主义、户籍制度、世代四方面探讨了影响因素^[4](P73-79)。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政治信任及其风险的形成、演变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另一方面,从学理上看,相关论证比较笼统,分析还有待深入和系统化。

关于政治信任及其风险形成和演变原因的分析,西方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主要是指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的观点。前者的代表性人物如美国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曾明确指出:“我在《信任》一书中解释了共享文化如何在特定的国家内成为高水平社会信任的基础,并且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成功。”^[5](第7版)后者的主要代表如英国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他认为“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连。信任在这里被赋予的,不是个人,而是抽象能力”^[6](P23)。

文化主义理论认为,政治信任是人际信任的延伸,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形塑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规范,政治信任是外生的,形成于政治领域之外,植根于文化规范和通过人们成长的早期社会化而形成的长期和根深蒂固的信念。从文化视角来看,对制度的信任是人际信任的延伸。在文化主义者看来,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或不信任,信任度上升或下降,主要是各种文化因素引起的。文化一词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按照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说法,所谓“文化,或文明……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7](P1)。这些因素都会对一个国家在特定时代的公民是否信任政治系统、对政治系统信任度的上升或下降产生深刻影响;或者说,一个国家在特定时代的公民所具有的价值观念、信仰信念、人文和科学知识、风俗、习惯、道德、法律,甚至艺术水准和欣赏能力,都有可能对特定的政治系统的信任产生影响,这些因素不但影响政治信任的水平,而且也会影响政治信任风险的形成、演变及其方向。

制度主义理论认为,政治信任是公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政治信任是内生性的。政治信任源于政治领域,是人们对政治制度、政府绩效、政治制度可信性的理性评估。在制度主义者看来,公民对政治系统是否信任以及信任程度如何,取决于政治制度及其绩效。一种优良的政治制度及其所产生的良好政治

绩效,能给公民带来实际利益,自然就会得到公民的信任;相反,一种劣质的政治制度所带来的政治绩效必然是不良的,因而公民对以这样的政治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系统的信任度也必然是低水平的。政治系统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如果其制度不能随着时代的要求变迁而逐步老化并降低政治绩效,其信任度下降的风险就会随之增加。政治制度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含的内容较多,一般是指统治阶级为实现阶级统治而采取的统治方式、方法及其相关规范的总和,包括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政党制度,公民的参政议政制度,政策制定与执行制度以及官员的选举、任免与监督制度等。这些制度直接影响公民在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和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亲疏程度,其产生的绩效还直接影响公民的实际利益。因此,公民是否信任政治系统以及信任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政治制度。当政治制度不能满足公民的要求并出现政治绩效下降时,就可能存在政治信任下降的风险。

其实,无论是文化主义还是制度主义,一方面,他们忽视了政治系统内部组织体系的信任问题,仅仅从公民及其外部因素与政治系统的关系来讨论政治信任问题,因而有关政治信任的探讨是不全面的;另一方面,他们把文化和制度割裂开来,仅从文化或制度一个方面来解释政治信任及其风险形成和演变的原因,同样存在片面性。事实上,政治信任及其风险的形成和演变既受政治文化的影响,又受政治制度的影响,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共同构成政治信任及其风险形成和演变的原因或基础。首先,从文化因素看,国民的信仰、价值观、社会心理与集体认知以及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记忆等等,都会对政治信任有重要的影响。比如,就今天的中国来说,一些坚持西方资本主义信仰和价值观的人,就有可能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系统保持较低信任度。如果这种人多了起来,并多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一种反对社会主义的集体认知和集体意识,从而从根本上降低我国的政治信任度,给我国的政治信任带来挑战和风险。国民的信仰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受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一些国家往往通过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来提升本国的政治信任度,并防范政治信任风险。国家的历史记忆构成本国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些历史文化传统不但会影响政治系统内部组织体系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程度,而且还可能会影响政治信任的特点。例如,在我国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中,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往往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而美国公民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则大大低于对基层社区的信任,这就是由两国的历史传统不同造成的。其次,与文化相关的信息因素,对政治信任及其风险的形成和演变也有着重要影响作用。信息一般指消息、通信系统传输和处理的对象,也可以泛指人类传播的一切内容。人们之所以能够交流,很大意义上就是因为有信息这个中介起作用。在政治过程中,政治系统内部组织体系中组织与组织、组织与官员、官员与官员的交流,公民及其外部环境因素与政治系统的交流,同样需要信息作为中介。从公民与政治系统的交流来看,政治系统发出的信息是否真实、可靠、及时,是否能满足公民的需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系统内部组织体系中各要素的相互信任和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以及信任程度。其三,制度因素对政治信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良好的制度有利于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公民及其外部环境因素与政治系统的互动,有利于公民参政议政,有利于制定有益于公众的公共政策,从而有助于提高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互信度和公民及其外部环境因素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度,规避政治信任的风险。同时,良好的政治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诚信,能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从而为提升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度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信任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良好的政治制度有利于政治系统产生良好的政治绩效,给公民带来直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公民也是自利人,他们会对一个给自身带来更多利益的政治系统产生更多的信任;相反,如果政治系统产生的政治绩效与公民所期望的相差很远,表明与这个政治系统相关的政治制度存在严重的问题,因而会使公民对这个政治系统的信任度下降,从而推动政治信任的风险上升。最后,个体因素,如个体的经验、处境,不仅会影响个体对特定官员或组织的信任,而且会影响个体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度。如一个曾经遭受过特定政治系统打击和迫害的人,在他的人生经历中可能会对这个政治系统存在不信任或低信任。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也有很多例外。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处境艰难的人,他或他们也可能把自己的不幸归结于政

治制度或政治系统,从而造成对政治系统的不信任或低信任。在社会中,当这部分人还占很低比重时,极少数人对政治系统的不信任或低信任并不会对政治信任带来挑战和风险。但是,如果这部分人越来越多,以至于在社会上占有很高比重时,则意味着政治信任风险的上升,甚至面临着具有威胁性的风险,需要引起政治系统的高度重视。

二、政治安全及其内在逻辑

关于政治安全,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明确表述: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8](P1)。从这里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将政治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是第一位的内容,可见政治安全的重要性。

如何解读政治安全?虽然目前已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献,但很多都是对策性分析的文章,对政治安全内涵和外延及其基础理论深入探讨的有价值的文献并不多。马振超在《当代中国政治安全的现实逻辑和终极价值》中,对政治安全的内容进行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政治安全的内容包括政权安全、执政安全、人民安全等,终极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政治权利安全^[9](P3-32)。但是,这种对政治安全的理解,主要是指出政治安全包括哪些内容,即只是从外延方面阐述了对政治安全的理解,至于政治安全的内涵是什么,该文并未能给出答案。要对一个重要概念进行理解,必须揭示这个概念的内涵,因为内涵才是概念所要反映的事物的本质。胡象明、罗立在《系统理论视角下政治安全的内涵和特征分析》中试图阐述政治安全这个概念的内涵。文中指出:政治安全的内涵是政治系统运行有序、政治结构相对稳定以及政治系统保持可持续发展^[10](P81-85)。在这个定义中,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系统运行有序,这是政治安全的第一要求。政治系统运行是政治系统充满活力并有效实现其功能的一种重要表现,一旦政治系统不能运行或不能正常运行,则表明政治系统出现了严重问题,政治系统的功能也就无法实现。同时,一个安全的政治系统不但需要运行,还需要这种运行是有序的,如果政治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失序,如同列车在运行过程中有可能脱离铁轨一样,表明已存在着重大安全隐患。二是政治结构相对稳定。对政治系统来说,安全与稳定是分不开的,政治系统的稳定中,最重要的是政治系统结构的相对稳定。政治结构是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政治法律设施、制度及其相互关联的方式,内容包括政党、政权机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实体性要素以及政权的组织形式、立法、司法、宪法和规章等制度性要素。只有当政治结构及其要素的相互联系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政治系统才能实现上面提到的有序运行,或者说政治结构相对稳定是政治系统运行有序的必要条件。如果政治结构不能做到相对稳定,政治系统也就无法保证运行有序,因此政治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三是政治系统保持可持续发展。政治结构的稳定之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政治系统的发展,需要根据政治环境的发展变化做出相对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发展变化。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任何系统都存在一定的环境之中,而环境总是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系统必须适应环境的发展变化并不断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与环境的变化相适应,否则,一个完全静态的系统就有可能走向衰退甚至死亡。政治系统也是一样,需要及时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使之保持可持续发展状态,这也是保证政治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政治安全是一种动态过程中的安全,这种安全要求有序和稳定,但这种有序和稳定都是相对的,是运行、发展过程中的有序和稳定,而绝非静止状态的有序和稳定。这样的政治安全应该是一种政治系统充满活力、有着无限发展前景的政治安全。

根据以上对政治安全的理解,我们认为,政治安全问题涉及政治系统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两个维度:一方面,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体系必须要有健全的体制机制,这是政治系统运行有序、结构相对稳定并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根本前提。如果内部组织体系出了问题,政治系统的运行可能会进入无序状态,或者政治结构原有的相对平衡会打破,相对稳定不复存在,而且也不再可能按照原有的轨迹发展。总之,

政治系统的安全机制有可能会遭到破坏,我们将这个方面的政治安全称为政治系统内部安全。另一方面,政治系统的外部支持力量持续增加且能够有效控制外部威胁,这是政治安全的一个重要条件。上文已经提到,任何一个政治系统均处于一定的外部环境之中。对政治系统来说,外部环境既可以是一种支持力量,也可能是一种威胁力量。就外部环境与政治安全的关系而言,当外部环境的支持力量大于威胁力量时,就为政治系统的有序运行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条件,政治系统是相对安全的;相反,当外部环境的威胁力量大于支持力量时,政治系统的有序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就有可能遭受挫折,政治安全可能会成为问题,我们将这个方面的政治安全称为政治系统外部安全。再者,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和谐程度,与政治安全也有着紧密的关系。如果政治系统内部组织体系与外部环境能够实现和谐沟通,政治系统可以有效整合外部因素并得到外部环境的认可与支持,那么,政治系统则可能在这种和谐沟通中实现安全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否则,如果政治系统内部组织体系与外部环境存在沟通障碍甚至冲突,那么,就有可能构成对政治安全的威胁。因此,政治系统的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按照上文关于政治安全的内部组织体系和外部环境两个维度的解释,政治安全存在以下三重逻辑。

一是政治系统的内部安全逻辑。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体系越健全,政治系统就越安全;反之亦然。根据上文的分析,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体系健全是政治安全的根本前提,如果没有这个根本前提,政治安全几乎无从谈起。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对政治系统及其安全来说,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体系是内因,是政治系统得以有序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据,因而也是政治安全的根据,它的变化和发展对政治安全起着决定作用。因此,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体系与政治安全之间必然存在以下逻辑关系,即一个政治系统的运行与发展的安全随着其内部组织体系的健全程度的上升而上升,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体系越健全,则政治系统及其运行、发展越安全;相反,一个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体系越不健全,则政治系统及其运行、发展越不安全。这是由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体系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也是由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体系与政治安全的本质关系所决定的。

二是政治系统的外部安全逻辑。政治系统的外部支持力量越是持续增加且能够越有效超越外部威胁,政治系统就越安全;反之亦然。政治系统的外部支持或威胁力量尽管不属于政治系统运行及其安全的内因,但它属于其外因即外部保障条件。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因而就政治系统的外部支持或威胁力量与政治系统运行及安全的关系而言,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因此,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体系与政治安全之间必然存在以下逻辑关系,即一个政治系统的运行与发展的安全随着其政治系统的外部支持力量增加且威胁力量减少而上升,政治系统的外部支持力量越多且威胁力量越少,则政治系统及其运行、发展越安全;相反,一个政治系统的外部支持力量越少且威胁力量越多,则政治系统及其运行、发展越不安全。这是由政治系统的外部支持或威胁力量对政治系统的重要性所决定的,也是由政治系统的外部支持或威胁力量与政治安全的特定关系所决定的。

三是政治系统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安全逻辑。政治系统内部组织体系越健全且越能可持续发展,越是能够与外部环境合作和交流,从而越能够得到外部力量的支持和减少外部威胁,政治系统就越安全;反之亦然。政治安全不但既受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体系的健全程度决定,又受外部环境支持力量和威胁力量的彼此增减程度制约,而且还受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体系与外部环境力量的相互合作、相互作用的水平制约。如果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体系能够与外部环境力量保持良好的合作且相互沟通顺畅,政治系统的外部环境对内部组织体系的支持力量就会上升且威胁力量会相应下降,从而使政治系统及其运行更加安全,反之亦然。因此,政治系统内部与外部相互作用的过程对政治安全存在以下逻辑关系:随着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体系与外部环境力量的相互合作、相互作用的水平不断提升,政治安全水平也不断提升。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体系与外部环境力量的相互合作、相互作用的水平越高,政治安全水平也越高。相反,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体系与外部环境力量的相互合作、相互作用的水平越低,政治

安全水平也越低。这是政治系统内部组织体系与外部环境力量的相互作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决定的。

三、政治信任风险传导作用下的政治安全逻辑

关于政治信任对政治安全的影响,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做过一些探讨。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在《信任与统治》一书中比较深入地讨论了信任、信任网络及其与政治统治的关系,特别是讨论了信任网络对政治统治的影响,他认为,“民主的未来取决于信任网络与政权体系的关系”^[11](P14),一旦政府出现信任问题,就会给政治统治带来更高的风险,甚至会对政治统治带来严重的威胁。如果我们对政府出现信任问题称为政治信任风险,那么,按照他的观点,可以说政治信任风险与政治统治风险间存在着一种同向变化的逻辑关系,就是当政治信任风险提升时,政治统治风险也会提升;或者说,政治信任风险越高,政治统治风险也越高,以至政治信任风险给政治统治带来严重威胁即难以承受的风险。我国也有不少学者对政治信任与政治安全或政治秩序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如刘建平、杨铨在相关论文中指出:“政治不信任会带来怀疑、冷漠、恐慌、嘲讽、愤怒这种光谱式的由弱至强的后果,严重影响政治秩序稳定。任何国家都需要保持较高水平的政治信任以维持其合法统治和有效治理。”^[12](P171)这里说的政治不信任指的就是严重的政治信任风险,而政治秩序则与政治安全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政治不信任对政治秩序的影响,即为政治信任风险对政治安全的影响。这些研究均表明,政治信任风险与政治安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

正如德国风险社会理论家贝克所言:“今天的现代化(即自反性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即风险社会)则正在形成中。”^[13](P3)后工业社会,新兴技术的发展推高了社会风险,使现代社会正在成为名副其实的风险社会。之所以讨论政治安全,是因为政治存在着风险,而追求政治安全就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在已经到来的风险社会,政治的风险度更高,因而谋求政治安全变得更加重要。之所以政治信任与政治安全间存在着紧密关系,从风险传导理论的视角看,是因为政治信任有可能将风险传导给政治安全,从而给政治安全带来风险。可传导性是风险的特征之一,任何风险都具有传导的特性,具体表现为某种风险可以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传导,如在企业的产业链中,上游产业的风险有可能传导给下游产业,反过来也一样;或者某种风险可以在不同的事物或事件上进行传导,如政治方面的风险有可能传导到经济方面,如中美关系的紧张导致的政治风险,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都会带来相应的风险。因此,所谓风险传导,就是指风险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或者在不同事物或领域之间的传导。政治信任风险向政治安全的传导,就属于后一种类型即风险在不同事物或领域之间的传导。

风险的传导有其特定的路径,风险传导路径即指风险在传导过程中的基本路线。根据风险的性质、特征和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不同事物或领域之间的传导,形成特有的传导路径。我们前面在阐述政治信任风险时,区分了政治系统的内部信任风险和外部信任风险,其实,内部信任风险和外部信任风险也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问题。在分析政治安全逻辑时,提出了政治安全的三重逻辑,即内部安全逻辑、外部安全逻辑和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安全逻辑。政治信任风险向政治安全传导的路径,是由政治信任风险和政治安全逻辑二者的特性决定的。基于上述分析和阐述,政治信任风险向政治安全的传导大致也是遵循以下三条路径,并因此形成特定的逻辑关系及其特征。

一是基于政治信任风险内部路径传导的政治安全的逻辑关系及其特征。所谓政治信任风险的内部路径传导,是指政治信任风险在政治系统组织体系内向政治安全传导,从而给政治系统的内部安全带来风险。因为,如果政治系统内部的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官员之间、官员与官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不确定时,政治组织体系的体制机制就不可能健全,凝聚力弱,这样就很难保证政治系统运行有序、结构相对稳定并可持续发展。因此,政治系统的内部信任风险传导至其内部安全,会导致政治系统的内部安全形成风险,进而带来政治系统的整体安全风险。因此,政治信任风险经内部路径向政治安全传导,会使政治安全的逻辑关系呈以下特征:政治系统内部信任风险越高,意味着政治系统内部组织之间、组织与官

员之间以及官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度越低,因而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体系的体制机制可能不健全且凝聚力越弱,导致政治系统难以有序运行和可持续发展,这就意味着政治系统内部安全风险越高,乃至政治系统整体风险也越高,政治系统安全度越低;反之亦然。这种逻辑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简化表述为:政治系统内部信任风险高→政治系统内部凝聚力弱→政治系统内部安全风险高→政治安全度低;反之,政治系统内部信任风险低→政治系统内部凝聚力强→政治系统内部安全风险低→政治安全度高。

二是基于政治信任风险外部路径传导的政治安全的逻辑关系及其特征。所谓政治信任风险的外部路径传导,是指政治信任风险在政治系统组织体系外的环境系统向政治安全传导,从而给政治系统的外部安全带来风险。因为,当公民及其外部环境因素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不确定时,公民及其外部环境因素就不会积极支持政治系统的决策和各项行动,这样,政治系统的各项决策就难以顺利实施,也难以产生良好的政治绩效,并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增加政治系统的外部威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政治系统的外部安全风险,并从整体上降低政治的安全度。因此,政治信任风险经外部路径向政治安全传导,会使政治安全的逻辑关系呈以下特征:外部政治信任风险越高,意味着获得的政治支持力量越少,即政治资源越少,因而政治系统的外部支持力量越是有可能会减少而外部威胁力量有可能会增加,外部政治安全风险越高,从而政治系统安全度越低;反之亦然。这种逻辑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简化表述为:政治系统外部信任风险高→政治支持力减少而威胁力增加→政治系统外部安全风险高→政治安全度低;反之,政治系统外部信任风险低→政治支持力量增加而威胁力量减少→政治系统外部安全风险低→政治安全度高。

三是基于政治信任风险内外相互作用路径传导的政治安全的逻辑关系及其特征。如同政治系统内部体系与外部环境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一样,政治系统的内部信任风险与外部信任风险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内部信任风险对外部信任风险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外部信任风险对内部信任风险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内部信任风险的提升会促使外部信任风险的提升,外部信任风险的提升也会促使内部信任风险的提升;反之亦然。政治内外信任风险的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也会传导给政治安全,因为政治系统的内外安全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如果政治系统的内外政治安全风险通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会提升政治系统的总体安全风险,从而会导致政治安全度的降低;反之亦然。因此,政治信任风险经内外相互作用路径向政治安全传导,会使政治安全的逻辑关系呈以下特征:政治系统内部信任风险越高,外部风险也会越高,从而政治系统的总体信任风险越高,并因而导致政治系统的内外安全风险越高,总体安全风险也越高,政治安全度越低;反之亦然。这种逻辑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简化表述为:政治系统内外信任风险相互推高→政治系统整体信任风险更高→政治安全风险高→政治安全度低;反之,政治系统内外信任风险相互拉低→政治系统整体信任风险更低→政治安全风险低→政治安全度高。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首先是政治信任风险包括政治系统的内部信任风险和外部信任风险。内部信任风险主要与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体系相关联,外部信任风险则主要与政治系统的外部因素相关联,其中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风险是外部信任风险的最重要的内容。关于政治信任风险形成的原因,无论制度主义还是文化主义的解释都不够全面,政治制度因素和政治文化因素,对政治信任风险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其次是政治安全有自身的逻辑。这方面的逻辑是由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体系、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组织体系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体系的体制机制是否健全,是政治系统安全的内在决定性因素,对政治安全起着关键作用;政治系统的外部环境形成政治系统的支持力量或威胁力量,是政治系统安全的必要条件,对政治安全起着保障作用;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沟通是否畅通、相互作用是否和谐,也对政治系统的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对政治安全的作用,构成了政治安全自身的逻辑关系。

第三是政治信任风险与政治安全风险存在着正向的逻辑关系。如果从风险的视角来看,不仅政治信任存在风险,政治安全同样存在风险。由于风险本身具有传导性,政治信任风险会传导至政治安全,形成政治安全风险。而且这两种风险是朝着同一方向变化的,即当政治信任风险上升时,政治安全风险也会上升;反之,当政治信任风险下降时,政治安全风险也会下降。政治信任内外风险的相互影响也会传导至政治安全风险的相互影响。尽管影响政治安全风险的因素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信任风险也是影响政治安全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提高对政治信任风险的认识,强化对政治信任风险治理,对管控好政治安全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如2018年1月在对新时代政法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时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14](P1)。当然,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不仅仅是政法战线的任务,整个政治系统及其领导者、管理者和普通的政务人员,都应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各个组织、各个部门和其中的各个成员,都具有不同的职责,具体措施、方法可能会涉及很多方面,在此无法做出详尽分析。但上述分析,对我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至少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强化政治系统的内部政治信任风险治理非常重要。应该说,政治安全首先取决于政治系统内部组织体系体制机制的健全,因为打铁要靠自身硬。从政治信任视角看,一个健全的组织体系,其内部必须保持高度的信任度,包括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任,官员与官员之间的信任,上级对下级的信任,以及下级对上级的信任等方面的信任度。如果政治系统的内部信任出现问题,甚至是严重问题,其内部组织体系就一定不会有健全的体制机制,这时,政治系统的安全就一定会出问题。因此,为保障政治安全,降低政治安全风险,政治系统需要强化其内部信任风险治理,建立内部信任风险的管制机制,采取相应措施,最大限度地防范和化解自身内部政治信任风险,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二是强化政治系统的外部政治信任风险治理非常重要。政治系统的外部政治信任,首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本国政治系统的信任,包括对各级政治机构、政治官员、政治代表人物的信任;如果扩展到国际上,还应包括国际社会对一国政治系统及其组织体系的信任。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多次指出,外部政治信任对一个政治系统来说,是其政治安全的重要保障条件。因此,为使政治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强化政治系统的外部信任风险治理,建立内部信任风险的管制机制,采取相应措施,最大限度地防范和化解其外部政治信任风险,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三是加强政治系统的内部政治信任与外部信任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机制建设。政治安全受政治信任的制约,其内容不但包括受政治系统的内部信任、外部信任的制约,还包括受政治系统的内部信任与外部信任相互作用的制约,内部信任风险的提升可能会推高外部信任风险。同样,外部信任风险提升可能会推高内部信任风险的提升,而且两种信任风险交互作用可能会推高总体政治风险,使政治安全面临更大威胁,包括内部威胁和外部威胁形成的威胁合力,从而给政治安全带来更大风险。因此,加强政治系统的内部政治信任与外部信任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机制建设非常重要,建立两种信任的相互交流和沟通的良性机制,形成可通过内部信任风险的降低而促进外部信任风险的降低或可通过外部信任风险的降低而促进内部信任风险的降低的互动机制,从而从总体上防范和化解政治信任风险,进而防范和化解政治安全风险,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总之,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政治安全,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信任环境。“良好的公共治理,需要有一个低风险的公共信任环境。”^[15](P100-107)在风险社会时代,面对当前政治信任存在着多种不确定因素,需要建立有效治理政治信任风险的机制,坚决防止政治系统跌入塔西佗陷阱^[16](P7)。政治信任风险治理无疑是当代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今天的政治学界来说,不仅应把政治安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而且应把与之相关的政治信任问题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加强这方面课题的研究,可为政治系统的政治实践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可行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 [1] 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 [2] 马得勇.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5).
- [3] 刘建平,周云.政府信任的概念、影响因素、变化机制.广东社会科学,2017,(6).
- [4] 王毅杰,乔文俊.中国城乡居民政府信任及其影响因素.南京社会科学,2014,(8).
- [5] 弗朗西斯·福山.亨廷顿的遗产.赵纪萍编译.社会科学报,2018-09-20.
- [6]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 [7]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8] 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人民日报,2014-04-16.
- [9] 马振超.当代中国政治安全的现实逻辑和终极价值.国际安全研究,2018,(3).
- [10] 胡象明,罗立.系统理论视角下政治安全的内涵和特征分析.探索,2015,(4).
- [11] 查尔斯·蒂利.信任与统治.胡位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12] 刘建平,杨铨.政治信任:心理学视角下的前因后果.心理学探新,2016,(2).
- [13]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 [14] 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主要任务.人民日报,2018-01-23.
- [15] 胡象明,张丽颖.公共信任风险视角下的塔西佗效应及其后果.学术界,2019,(12).
- [16] 普布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塔西佗历史:第1卷.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Trust Risk

Hu Xiangming(Beihang University)

Abstract Political trust includes the trust among elements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trust to the political system among external factors including citizens. The former trust can be called internal trust, and the latter can be called external trust. There exist risks inevitably in the modern risk society, whether it is internal trust or external trust.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political trust and its risks are influenced by both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system. Political security has its own logic, including internal security logic of political system, external security logic, and the interaction security logic between internal organization system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theory, the risk of political trust has a transmission effect on political security. There is a specific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trust risk and political security risk, including internal trust risk, external trust risk, or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ust risk. Therefore,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political trust risk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political security risk and maintaining national political security.

Key words political trust; political security; trust risk; security risk; risk management

■ 收稿日期 2021-04-16

■ 作者简介 胡象明,政治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安全应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广西大学中国—东盟公共治理研究院特聘教授;北京 100191。

■ 责任编辑 涂文迁